

生死民主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John Keane

[澳] 约翰·基恩 著 安雯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生死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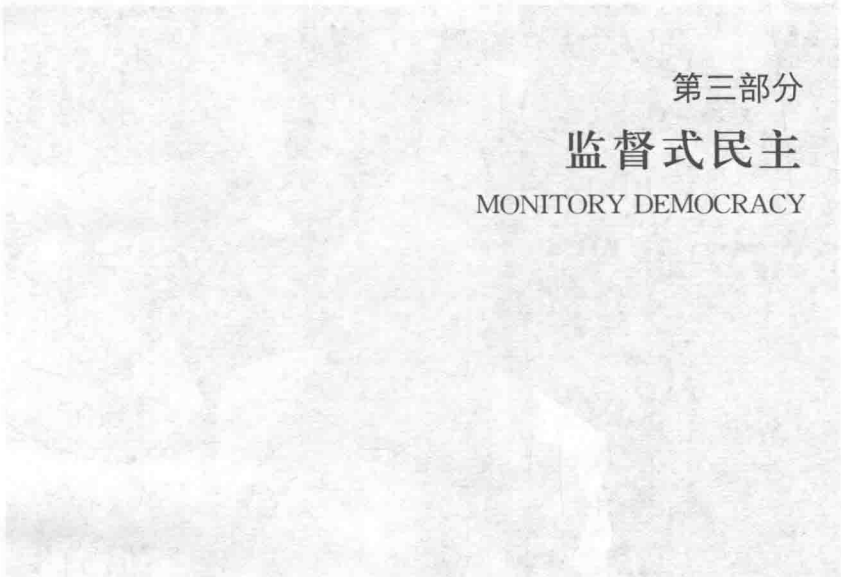


【澳】约翰·基恩 著

安雯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第三部分

监督式民主

MONITORY DEMOCRACY



2016年6月16日,埃及开罗。一名妇女在总统选举投票后展示她用墨水做过标记的手指,她身后其他人在排队准备投票。纳赛尔·纳赛尔(Nasser Nasser)摄。

第七章 菩提树下

当现代武器让小小的欧洲远征军能够消灭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军时，殖民主义诞生了；而当这些大帝国找到它们自己的武器时，殖民主义的末日也就到了——而这些新武器还不仅仅是枪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58年)

云端上

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民主的理想和制度逃离两次世界大战、专制和极权主义留下的废墟更奇妙的事情了。印度次大陆上的民主大突破，最早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成百万上千万的人白手奋战，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印度诞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前沿的民主制度，它始于公民的勇气，得益于以法治克制暴力冲突的实践和顽强的领袖人物，还有几分好运气。民主的诞生仿佛一曲民谣中的梦幻，一篇异国传说中的神话，民主之精灵被从人间放逐到天空，绝望中它突然腾云驾雾，冲回大地，降落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之南的某个地点，它巡弋四方，在这片今天被称为印度的阳光灿烂的土地上播种耕耘。

民主的降临改变了印度人民的生活，而印度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代议民主的性质。它提供了一种“后西敏寺制”(post-Westminster)式的民主，印度的民主让以往有关民主制度的标准前提不再成立。人们说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基本前提，所以，只有在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拥有或享有如汽车、冰箱和无线通信之后，才有可能实行代议民主。而印度的贫困人口数量之大、比重之高令人心碎，不少人坚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甚至是可以计算的数学关系。据此，统治者认为，印度人还不适

合实行民主。但千百万贫穷、不识字的印度人却拒绝接受他们主人的观点，他们决定反抗偏见，通过民主过程让自己适合民主。他们的成就让这些伪科学和宿命论的民主前提成为笑料。

与许多国家形成对照，印度的经验不仅证明专制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必需品，它还显示，通过尊重彼此的差异，可以在一个高度多样性的国家实现政治的统一；也就是说，尽管存在一切不利条件，民主制可以拥抱十几亿人，这些人有不同的历史和习俗，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欧洲人。以往的常识是，只有在共享有同一文化的民众中才可能实行民主，印度再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反例。生活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印度人民的希望何在，他们的政府应该为人民做些什么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答案。有些人认为真正的民主要求社会世俗化，即宗教完全退回到私域或者彻底消失，印度人自然没有理会这一套论调。在印度，有些人（遵循佛祖的教诲）弃绝尘世的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无我，说万事无常在，强调以个人力量而不是集体力量实现救赎。在这个国家，阿訇宣布他们看见了新月之后，穆斯林即开始长达 30 天从日出到日落的禁食；在这里，赤脚的信徒合掌走进寺庙，一边聆听着音乐，一边将万寿菊穿成长串，然后享用一顿寺院的素餐——豆羹和薄饼；在这里，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印度教徒，他们每年主办春节*，不论是否是印度教徒，人们均穿上黄色的衣服，高声念着祷文，互相泼洒彩色的水和粉末，朗诵和上演大神罗摩诞生的故事。

587

好政府？

这些习俗让大英帝国的主子们相信，他们家乡的议会民主，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甚至，与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完全不同，印度是白种人的负担，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到处是乱七八糟的麻烦和令人不安的习俗。对这个算不上是个国家的地方，最好的描述是[正如吉卜林(Joseph Kipling)在 1901 年小说《基姆》(Kim)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幸

* 春节，即洒红节，印度教四大节日之一。因处于每年公历 3、4 月间的春季，也被称为春节。——编者注

福的亚洲式的失序”。这个混沌世界不接受西方式的进步观,也就是说,英国人在这里自以为是地扮演监护人的角色,顽固地认为这个古老的文化需要他们提供的法律和秩序。丘吉尔夸耀说:“将印度从野蛮、暴政和内战的时代拯救出来,让它缓慢但不懈地走向文明社会……是我们最美妙的历史成就。”但是,紧接着,他又忍不住要开始抱怨了:“印度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地理词汇。说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还不如说它是赤道线。印度有很多的国家 and 民族,有几百种宗教和不同的教派。在印度的3.5亿人口中,只有几百万人能够读写,这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对政治和西方的思想有兴趣。其余的人都还过着每天为糊口操心的原始生活。”因此,印度的未来不是民主。丘吉尔的结论是,如果有人说“无数的印度人都愿意在英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下,在和平、幸福和体面中生活,而我们却认为这样的观点实属荒谬;之所以说它荒谬,不是因为印度人民天生不适合现代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政治、社会、民族和宗教环境(不适合民主制度)”^①。

自然,大不列颠白人阁下们命中注定是印度有色人种的主子。像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的库尔兹先生,他们觉得,周围都是些偶像崇拜的野蛮人,而自己则是无比优越的统治者;像库尔兹周围的人一样,越来越多的土著也得出自己的结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极度自信,实际上已经近乎精神失常。不过,在那个时候,当地人想些什么都不作数,只有大不列颠的统治万世长存。在统治者眼里,好政府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有总督负责督导,有殖民地官僚政府和司法系统协助运作,大家交流的语言是印度英语——这是当地唯一的大家都能够懂得的语言。好政府还意味着殖民地的主子们愿意承担领导责任,展示他们真诚地“代表”了被统治者的意愿。这是一种对代议制极为奇特的理解,完全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政治学教授为十全十美的上帝之国进行辩护的腔调。殖民地的总督名义上超然于一切“政治”之上。他们认为自己是“政策”的真诚载体,当地人如果有机会参与政府事宜,他们的角色也仅仅是顾问性和协商性的。

1857年至1858年印度人民发动了历时13个月的“反英大起义”之后,帝国当局在印度成立了总督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此后殖民时代的

代议基础。委员会的目的是让当地受到邀请的头面人物,向实施统治的印度文职政府(ICS)提供“当地人的意见”。印度殖民地的代议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寡头政治,一个由小圈子组成的不容挑战的政府,与当地的属民保持“某种接触”,明摆着是英国人为方便他们的管治要分化印度人,将以往模糊的身份变成明确不变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地主”。在19世纪80年代,里彭伯爵(Lord Ripon)任总督期间试图在印度引进分权政府的努力,展示了一模一样的东方学者的偏见。他的改革目的是减轻政府的负担,将许多琐碎的小职能转交给当局挑选的地方官员,或者当地选举产生的“地方董事局”(native boards),这些地方机构将管理本地的卫生、道路和学校等事务,而且被要求自己筹措资金。

589 英国人从当地一小撮有产者中,主要是商人和专业人士中挑选几位来帮助殖民地政府工作,里彭伯爵将这些不拿报酬的社会名流称为“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不能调动他们的力量,不仅是政策的失败,而且是浪费资源”^②。主旨还不在于节约政府的成本,这是分而治之的策略,一种给印度人戴上笼套,让他们远离政府权力中心的手段。自上而下的代议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统治者的统治,尽可能地保证“政策”不受被分化且糊里糊涂的统治对象的干扰。《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The 1919 Government of India Act*)公开展示了这种偏见。因为印度人民的不断反抗,英国当局第一次在印度各级政府实行直接选举;准许在省一级从立法会议员中挑选印度人担任部长,负责某些殖民当局“移交的”政策。

不过,小魔鬼都藏在法案的各个细节里。在年满21岁的印度人中,只有十分之一的男性和0.5%的女子——不到总人口的3%,有权在省级政府的选举中投票。而他们选出的代表基本上毫无权力。这些当选代表负责的所谓“移交”的政策严格限制在“国家建设”领域,如教育、工业、农业和地方行政自治。强制和榨取性的权力——对警察、法庭、监狱和土地收入的控制,仍然控制在非选举产生的省长和省长任命的行政委员会的手里。同时,在中央政府一级,印度政府仍然不是一个问责政府。总督完全不受当地人的制约,也不是“民选”联邦议院能够控制的人物。在1930年,印度联邦议院由40515名选民选举产生,而英属印度的总人口是2.57亿。

这些机构的设计师似乎从来没有想到,在印度人面前摇晃这些伪代议制度,只能招惹人家更强烈的抵触,印度人早晚要用这些手段给大英帝国掘墓,为自己争取尊严。莫利子爵(Lord Morley)在英国上院做过一次很有名的发言,声称他要坚决地阻止兴建任何“导致在印度建立议会制的殖民机构”^③,他的态度是那一代殖民官员傲慢的典范,他们真心相信他们会在印度继续统治下去。

正是基于这种坚定的自信,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决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修建新的议会大厦(图96)。大厦外墙使用的是采自邻省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红色和奶白色的大块砂岩,这座建筑被认为是一件不受时间侵蚀的珍宝。两位建筑师都是帝国名流,埃德温·鲁特严斯(Edwin Lutyens)爵士和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爵士,他们负责整个新德里的规划和建造工作。1921年2月12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康诺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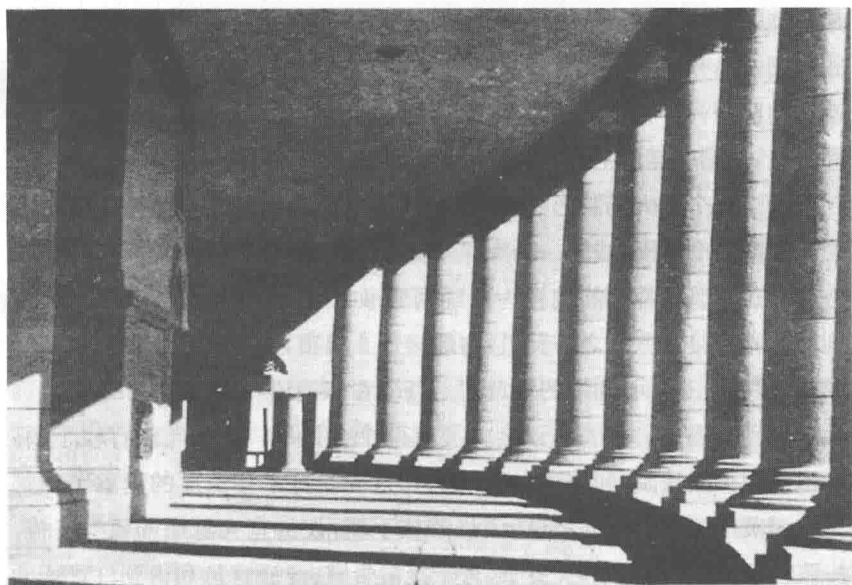


图96 新德里议会大厦一楼的柱廊。

公爵(Duck of Connaught)殿下为议会大厦主持了奠基大典。公爵刚刚参加过为他举行的马球冠军赛,而在前一晚还出席了富丽堂皇的国宾舞会,显然不处于他的谦卑状态。他对他的听众说:“所有伟大的统治者,每一个伟大的人民,每一个伟大的文明,就像留下自己的历史典籍一样,都在岩石和青铜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他提醒听众回想雅典卫城和罗马古城——他自然有意识地没有提到“*lokshahi*”这个字眼,这是印度刚刚流行起来的一个新的政治名词,一种源自印度—波斯传统的民主——他预测说,“这个新的代议机构”标志着“印度和大英帝国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它将成为“印度追求更高生命境界的新生”的有力象征。^④

591 伴随着这些极为优美的言辞,当局在印度各地征募劳工,在英国米字旗下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不惜成本,整整进行了6年,耗资超过830万卢比。建筑师知道建筑和权力是一对孪生子,当一座建筑被放置在历史的大尺度上,一头是雅典,一头是印度帝国,中间的过道是伦敦的西敏寺宫议会大厦,那么,它的修建开销无论多高,都不值一提。赫伯特·贝克尔爵士已经为南非联邦修造了议会大厦,他给自己的目标是“依照已经成为经典的、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元素和传统进行设计,在这个基础上嫁接上印度建筑和印度神话、符号和它的人民的历史的结构特征”^⑤。在大厦竣工正式启用的典礼上,宣读了英国国王—印度皇帝的祝词,陛下表达了他对新建筑的愿望,它“将以博爱和服务的理想,以及我的臣民确保享有的和平和繁荣,激励印度的王公和人民”^⑥。

592 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物,在当地遭到很多批评。德里人笑话它说看起来像个牛圈,或者一个大煤气储气罐。但建筑师自己坚信,任何长方形的建筑风格都可能被视为鼓励两党政府,酝酿宗教隔阂。议会大厦圆环的周长接近三分之一英里,占地接近6英亩,建筑物座落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坪的正中间,四周的绿草坪上点缀着棕榈树和玫瑰园,和一道装饰性的红砂岩围墙。巨大的议会大厦有两个会议厅:灰色大理石柱子、马蹄形的中央立法院,和作为上院的联邦议院。每个会议厅的基本结构都是按照英国议会设计的,包括议长的扶手椅,议员宽大舒适的弧形座椅,一张供议会职员使用的大桌子,若干接待贵宾、政府官员和得到许可证的公众的包厢和旁听席。在下院和上院的之外,还有第三个大厅——王公

院,来自大印度各邦的统治者可以在这里聊天、放松、打盹。三个部分被中央会议大厅联结在一起,大厅铺着绿色的地毯,上方是壮丽的圆拱顶。在这里,王公和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可以走到一起,在会前或会后喝茶和交谈。中央会议大厅周围环绕着三个露天庭院,院子里有喷泉,水池里游弋着色彩斑斓的金鱼,装饰着镂空雕刻(jali)的白色大理石石板,还有缅甸柚木刻制的护壁板和家具。以西敏寺大厦为样板,中央立法院的会议室(和英国下院一样)布置着绿色的地毯和绿色的皮面桌椅,联邦议院则模仿英国上院,铺张着耀眼的红皮子和红地毯。大厦里安装了铜制电风扇去除暑气,墙上和窗户上装着印度建筑的标志——精雕细作的小穹拱(chhajjas)遮阳,仔细看去,每件雕刻竟然都是当地的各种文字,教诲礼让和遵纪守法。当然什么是法律则由这个权力中心说了算。在豪华的王公院,穹顶上写着两行金色的波斯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分别是:“云殿如翠谨铭金句”,“万物皆朽惟存大善”。

这些字眼的含义非常模糊——非善,也就是那些恶行经受不住时间的严酷考验——但问题是把持了权力的人对此似乎既不明白,也不在乎。在1927年1月18日的落成大典上,印度总督艾尔文勋爵对这幢张扬的建筑作了一番言辞优美的评论,赞扬它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和永恒的政治意义。这位左臂先天残疾的总督大人,后来成为对希特勒绥靖政策的主要推手。他不可能知道,议会大厦落成20年后,1947年8月14日落日之前,印度人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更让人难忘的大典。印度的三色国旗在议会大厦前升起,时值雨季的尾声,天空上出现了吉祥的彩虹。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瘦削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身着长及膝盖的白色阿肯礼服(achkan),领口别着一朵红玫瑰,站在印度立宪大会前宣布,印度终于挣脱了英国人傲慢和残忍的统治,实现了自己的独立。

593

尼赫鲁仅有4分半钟长的演讲,成为历史上印度人最著名的演讲。那些在现场或通过广播聆听到演讲的人,都记得它梦幻般的感人力量。他吐字清晰的英语带有上流社会的口音,他的演讲词既有谦卑又雄心勃勃,表达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渴望,要在这个被战争、暴行和征服撕碎、打垮的世界上,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全印度广播公司的麦克风传递着他轻柔的声音:“借此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宣誓,忠诚地为印度和印度人民服务,

忠诚地为整个人类服务。”尼赫鲁说，世界已是天下一家，不仅和平和自由已经不可分割，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灾难都会影响到世界上所有的人。尼赫鲁的誓言是一个历史性的约定，他要擦干全人类的泪水，给整个世界带来民主，从印度自己开始，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和自由。他说：“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和命运有过约定，现在到了我们践约的时刻了，不是逐字逐句或无所不包，但一定是实质性的兑现我们的诺言。现在不是怨恨和指责他人的时候。我们要在自由的大地上为印度母亲的所有孩子建造一个高贵的居所。”

此后的15年间，尼赫鲁和国民大会党艰苦应战，尝试以公正的手段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尼赫鲁自己这样告诉法国作家和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尼赫鲁脑海里的亚洲民主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复制。它是一种新式的自我管治共和国，一箭能够射杀三雕。它要砸碎老殖民主子拴在它身上的锁链；要抗拒在海外建立新殖民地的诱惑；还要建立一个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新国家，消除“国内殖民主义”的威胁。建国者继承的印度不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其内部建立在种姓制度、语言、等级和财富基础上的权力关系都将是舆论、政党竞争和定期选举争议的对象。印度的民主制是第一个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同时寻求国家统一、经济增长、宗教宽容和社会平等的尝试。

594 英雄——伟大的灵魂

印度国民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心目中的国家在现实中遭遇无数阻碍。当然，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中，这算是解开了印度与英国关系中的死结，方案对新生的共和国相当有利。但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实在还算不上是个国家。虽然英国人为次大陆的政治秩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的“国家性”(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还有待锻造。葡萄牙和法国在印度还保留着属地。各个土邦的君主和王公们表现

家陷入连续数年的有组织的大杀戮(图 97)。人们至今仍在讨论战乱的原因,但大家都承认分治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批移民,整个过程极其丑陋和恐怖。妇女和儿童被强奸、被拐卖。手无寸铁的难民遭到机关枪的扫射。到达目的地的火车悄无声息,车厢里塞满尸体。超过 1000 万人,甚至可能有 1500 万人跨越了边境,100 万人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残忍的杀戮促使印巴就边界线、武装部队和财政进行紧张的协商。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之间立刻爆发了战争。在海德拉巴(Hyderabad)和朱纳加德(Junagadh)两个邦中,印度教徒为人口大多数,但受穆斯林的统治,印度军队残酷地镇压



图 97 1947 年,旁遮普邦库卢谢特拉地区一个 30 万人的难民营,摄影:亨利·卡蒂埃-布雷斯松(Henri Cartier-Bresson)。这个地点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中“俱卢之野”之战的战场,故事讲的是数千年前一场善恶之争的大战。

了这两个地方的反叛。反抗帝国强权的自由精神似乎最后要在丑陋而坚硬的现实面前被击碎了。1948 年 1 月 30 日,甘地遇刺。

甘地在一个祈祷会上遭到枪击,凶手是极端派印度教教徒纳塔胡拉姆·戈德赛(Nathuram Godse),甘地对穆斯林的同情激怒了戈德赛,甘地的死给印度民主的未来罩上了阴影。(图 98)也许印度的命运不是自由加平等,而是报复、仇恨、谋杀?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都被视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民主战士之一。他是大英帝国自己制造的叛逆品。甘地来自中等种姓的商人和钱商之家,曾在英国学习法律。1893 年在印度短暂做过律师之后,他前往南非的纳塔尔(Natal)工作。在南非,白人殖民者歧视印度移民的种种政策,促使他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他在德班

596



图 98 尼赫鲁向哭泣的民众宣布甘地遇刺的消息,1948 年,德里比尔拉屋(Birla House),摄影:亨利·卡蒂埃-布雷松。

(Durban)郊外的一个公社农场修养时,开始阅读梭罗的作品,并开始与托尔斯泰和罗金斯等人通信。在南非,甘地开始践行他的“真理坚固”(satyagraha)理念,推行“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殖民统治运动。

精瘦、戴着近视眼镜的律师在 1915 年回到印度后,立刻卷入政治风暴,他发起,并和尼赫鲁等人一起签署宣言,宣布不服从 1919 年英国殖民当局发布的《罗拉特法》(Rowlatt Act),即“无政府和革命犯罪法”。同时他们还承诺尽最大力量推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 年 4 月 13 日,在阿姆利泽(Amritsar),将近 400 名不合作者被枪杀。事后看来,这一冷酷的镇压决定了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终结。甘地从此成为印度政治独立运动的道德领袖。在没有选举权的印度次大陆人民面前,甘地谦卑地承认,无论那些非经选举、自以为是、满口英文的精英们如何努力,单靠他们,绝不可能赢得印度人民的自我管治。精英们相信,可以通过晚宴上的交谈,或者通过派送代表团和递交请愿书唤起英国人的良知,而甘地的工作则是千百万印度城乡无权力者的自我赋权。

597 邻国的毛泽东坚信,反帝斗争只能是消灭当权者的武装斗争,甘地则不同,他属于公民社会。他的信念是,暴力太容易导致灵魂的毁灭,因此

是自由事业的威胁。所以他躲开“王公权贵们”(甘地语)的方式,主张非暴力的,源于古老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积极反抗,比如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联合抵制英国货(生产国货,自给自足)。他的工作和他的坚忍,让他成为当局迫害的对象。殖民政府认为他是闹事者,是古吉拉特(Gujarati)的素食者,企图让印度留在落后的角落里。甘地的敌人中不乏头脑狭隘的刻薄鬼,他们戏弄甘地的名字,公开将莫汉达斯·甘地,故意念成“穆罕默德·甘地”。但最后,甘地不屈不挠的勇气为他赢得了“圣雄”(Mahatma)的称号——“伟大的灵魂”。为了一个没有契约奴役,没有童婚,没有不可接触的贱民,没有宗教偏见和恶劣卫生的新印度,他承受了监狱、禁食和疾病的考验。

甘地的平等观有“西方”和“东方”的双重来源,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vishvamānav*”,一个属于整个宇宙的人——但是,这不保证这些观念能够相互一致。圣人如甘地,仍然不能完全消除自相矛盾。就非暴力而言,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比如,当妇女面临受到奸淫的威胁,再比如,那些将另一边脸颊转过去的人,如果他们不想被钉上十字架,他们需要武力行动保护自己。甘地对自我管治的民主政府的立场也相当模糊。他坚定地崇尚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民主美德,如真诚、参与、社会平等和宽容差异,但如何看待人民自我管治的政治制度,他却没有明确的意见。在印度国大党中,对甘地不断提到独立后的印度将回到罗摩治(Ram Raj)的黄金时代,不止尼赫鲁一个人公开表示出失望。听起来有些古怪,甘地的政治思想保留了强烈的反政治倾向。他认为独立的捍卫者应该响应“走向村庄!”的号召,印度最需要的是众多小型、自立、自我管治的“村社共和”世代相系的制度,每一个村社每年选举自己的村务委员会(*panchayat*),村委会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于一身。甘地要么忽略要么根本拒绝谈论成文宪法、议会、政党、法庭和定期选举的必要性。看起来,他仿佛是大会民主时代的人物。他的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著作是1908年出版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他在书中宣称自己主张“少数君子”的统治。自1920年起直到40年代初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甘地的思想是国大党的主导精神,他在党内实行的就是“君子统治”,他的统治手段包括诱惑和压力——长时间的沉默、戏剧性的禁食和苦修——他用这

598

些手段让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即人们所说的“指挥部”服从他的意见。印度独立之际，出于狭隘的精英主义观念，他要求解散国大党。“君子们”，或者说甘地的思想，将引导印度自我统治。

一方是甘地后殖民地国家分解成自治村社共和国，另一方是尼赫鲁的独立宪政国家，以议会为基础的自我管治，当时的人都能感到两者之间的冲突。尽管，印度的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甘地的村社理想社会，但直到他遇害身亡，他一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甘地遇害的悲剧，却颇具讽刺意味地让印度幸免了一场独立运动内部的人际纷争。在国大党两位最杰出的领袖之间，这场分裂本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甘地的死，也让新政府摆脱了起草和通过宪法过程中的权力较量。印度在1949年11月26日通过新宪法，宪法的主要制作者是甘地的一位老对手，“贱民”种姓的政治领袖、司法部长贝希姆劳·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

599 这部以篇幅之长和覆盖面之广著称的文献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印度人民”。以代议制民主原有的标准来衡量，印度宪法是一部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文献，它远远超越了西敏寺制模式。它的前言文字精辟冷静，它将印度描述为一个“主权民主共和国”，为所有公民谋求社会、经济和政治公正；思想、言论、信仰、宗教和敬拜的自由；身份和机会的平等；以及确保“个人尊严、国家的团结和完整”的博爱。新宪法中有整整一个部分用来陈述“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表明政府承担义务，为改善公民的福祉设定目标，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第43款)，为受歧视的特定种姓(设籍种姓)和特定部落(设籍部落)保留一定工作职位(第46款)，免费义务教育(第45款)。新宪法禁止随意逮捕和不经庭审的任意拘押(第22款)。它废除了“不可接触的贱民”制度(第17款)和“基于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和出生地的歧视”(第15款)。新宪法还宣布天城体的印地语(Hindi in the Devanagari Script)为官方语言，但同时同意继续使用英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第343款和350款)。宪法保障公民“从事任何工作，或者职业、贸易或经营”的自由(第19款)，严格规定不得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第24款)。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宗教组织的自治，国家仅在比如在信徒平等和社会福利的事务上保留干预权(第25款)。宪法规定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有极大的权力(第124款)；两院制议会，一为联邦院

(Council of States), 议员由各邦提名产生; 一为直选产生的人民院(House of the People)(第 78—81 款)。宪法有专项条款规定设立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监督、指导和管理选举(第 324 款)。并明确指出各邦每 2 年举行一次议会普选, 人民院议员任期为 5 年(第 83 款和第 326 款)。

我们不要恺撒

印度开始准备第一次自由的议会大选。苏库马尔·森(Sukumar Sen), 这位原为数学家家的公务员被任命为第一位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600
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成年男女都有权投票, 民众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同时也感到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而这是走向民主制所特有的体验。不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走向民主的转型期是超级不确定的时刻。以往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力量, 并被排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集团突然尝到了政治权力的滋味, 他们感到他们可以改变世界。无权力者准备和当权者调换一下位置。原来那些以为牢不可破的、天然的既得利益

* 与威廉·布思比、胡安·马塞蒂赫其他许多选举专家一样, 苏库马尔·森也是一位不为人熟识的英雄。森在 1950 年 3 月被尼赫鲁提名担任印度第一任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出生在 1899 年, 父亲是一位区长。森在加尔各答著名的跨宗教大学“院长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学习, 并在伦敦大学得到数学金奖。他在 1921 年进入印度政府工作, 曾经在几个地区担任法官, 1947 年他被任命为西孟加拉邦的布政司。森的生平不详, 他既没有留下文章也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当时, 他对数学的热爱和对寻求解答的耐心让他成为监督印度第一次大选的最理想的人选。印度大选的地理覆盖难以想象地庞大复杂。选举委员会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新的选举系统, 让 1.76 亿年满 21 岁的印度选民投票选举产生 4000 名议员, 选民中大约有 85% 不能读写。他们的方案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建立 22.4 万个投票站; 制造 200 万个钢质投票箱, 并发往各投票站。以 6 个月的合同招募 1.65 万名职员, 按照选区建立选民名单; 任命 5.6 万名监票官和 28 万助理监管投票; 22.4 万名警察届时将在投票站外执勤。森还必须同时寻找新方法解答其他一些问题。在每一个投票站设置多个投票箱, 专供不识字的选民使用。每个政党在自己分到的票箱上贴上象征本党的图片: 某党是大象, 某党是油灯, 国大党是两头小公牛。在印度科学家的合作下, 森还找到了一套防范冒名顶替的手段, 每个选民投票时按指纹; 提供 40 万瓶不易擦洗的指纹墨水, 手指上的墨水至少要能保持一个星期。为了选举的公平和平等, 森还必须解决男性家长为妇女选民制造的障碍。许多妇女在选民登记时, 得到鼓励使用自己的姓名, 而不是某某的妻子或某某的母亲, 但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 森批评这些对妇女的不信任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残留物”。他指示选举官员用妇女选民本人的姓名进行登记, 但有时却遭到妇女本人的拒绝。大约 280 万妇女因此未能完成选民登记。公众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怒, 森评却评论说这是“大好事”, 他准确地预见到此事有助于改变男性对女性的歧视。